

徐松石著作事跡編年考略（1899-1999）

楊天保 謝振治

廣西玉林師範學院桂東南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廣西學人徐松石，近世以降，大陸罕有專論，然其學術、思想之成就，豐碑在目。今者管窺斯人斯學，難有憑藉。以下略考徐先生歷年著作事跡，期於得見學人治學之大概。拋磚之言，缺漏自多，望方家斧正。

一、幼籍兩廣，陶英毓秀（1899-1915）

徐振凡（考，民國初年《容縣徐氏族譜》作「振奮」；1936年徐松石所編，嶺南徐氏家乘》頁93，以及1996年《容縣徐氏族譜》，頁134，皆作「振凡」。今據徐松石侄孫徐強稱，初名「振奮」，及長，自改「振凡」），字松石，又字仲石，信仰基督教後常以Princeton S Hsu, M.A.或Rev Princeton S Hsu, M.A.刊發文章。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三日生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容縣（考，其長女徐雙薇在《徐松石簡歷》稱：「1899年生於容縣」。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在收藏徐氏著作的「作者介紹」中，也定其生年為1899年。但是，1989年徐松石為容縣浪水鄉白飯村泗把祖居「恒升堂」賦詩一首之後，子侄徐祖椿為該詩作注稱：「泗把祖居建成1900年，即命名為恒升堂，叔父亦於是年誕生。」以1900年為生年，實誤。農曆1899年十一月十三日，時為公曆1899年12月15號。新舊世紀更替，先聲已著。後人憑藉祖居落成之典，追思前輩，巧為因果，約指1900年，情屬可原。另，今日學者又多以廣州為其出生地，亦不實。徐松石之父徐玉其在1897-1904年間，實地繪置容縣地圖，協修縣志，以及辦理徐氏私塾，行踪從未遠離容城，可為佐證¹），1999年謝世於美國舊金山。

魏晉以降，中原徐氏南渡之後，屢有遷變：宋末，贛南徐氏自江西寧都石城再舉南遷，「二郎公」率眾入福建連城；元末，其一脉隨「景山公」徐肇吉移至廣東惠州博羅縣羅仙都低田村，

首開嶺南新宗；未已，其長大房第三子「雲崖公」探玄先生（1326-1370，舊譜誤作探賢）又分支西進，擇居嘉應州蕉嶺縣懷仁鄉；迄於明末天啓年間，嘉應第九世者「一居公」徐春（字永所）再遷肇慶府新興縣大西路寧化都筋竹墟古丟村（今古調村）；康熙十二年（1673）左右，第十世者「成象公」徐玉環常往廣西梧州府容縣謀生，（同房另二支入高明、馬平）周旋日久，繼而「決意世居容地，乃在雍正末年。」²

徐松石乃嶺南徐氏「雲崖公」探玄先生第十九世孫，更直系於「成象公」徐玉環以下，所以，於家承大小淵源而言，嶺南故鄉有二：以大宗析之，則自稱「作者本人乃廣東新興縣客家族」，³牽連籍貫，情繫廣東新興縣；以小宗別之，1989年亦賦詩曰：「恒升垂訓見親心，孝德華風歲月深。」遙譴鄉思，寄語廣西容縣。另外，「咸豐之前，新、容兩地族人亦往還甚密。咸、同亂世，新、容音問漸疏。」⁴加之，現今徐松石一兄（徐振發，字同民）一弟（徐振池，字震池）之後人，概以廣西容縣祖居「恒升堂」為根基，並集有徐松石照片、遺墨、雜物多件。總之，「祖籍粵東而遷居粵西梧郡」，⁵捨大就小，詳今略古，別為宗支，乃時勢然也！徐松石十三世祖徐君智（字宜甫，1730-？），舉茂才後，於雍正年間創建廣西容縣「綉江書院」，「容族聲華」，由此而盛。君智公實為光大容族之祖。⁶

父徐玉其（字溫如，一字柱厚，1864-1950。考，徐振池在《溫如公簡歷》記其父生年為1862年，實誤。現有1924年《徐玉其溫如公六十偶吟》為證），「聰明卓絕，少小登科，」光緒十年（1884）中鄉秀才，1888年補晚清廩貢生，1904年任廣西泗城府西林縣儒學訓導，次年「偕胞弟世強、族弟學翹、圖存」，留學日本同文書院，並加入中國同盟會，開創容族留學和革命先

例。1906年回國後，倡辦容縣師範學校並領學監之職。同時，又在容城學宮創建「群秀女學」（一說為「育英女學」），並將泗把徐氏私塾建成「強志小學」，援引鄉弟子入校（按，該校1909年發展為高、初兩級小學，20年代末改村辦四級小學，1979年正式稱「泗把小學」），還收整往日之功，編著《根柢國文教育叢書》五種：《初學小文集》（三字讀本）、《初學小詩集》（五字讀本）、《常識辭彙》（四字字課讀本）、《常識辭彙解義》（教授參考書）、《分音字彙》（附聲音一覽表），皆由徐族駐廣州芳草街「餘南堂」出資發行。其中，《分音字彙》（附聲音一覽表）將中國、法國、英國等語，按發音分類，通采其優，構成世界語之雛形，為教育部備案。（參見徐祖慰，〈追憶往事——我祖父的言行〉⁷）1923-1925年出任澳門孔教學校高三教員，1925年為廣東大學代理舍監。⁸

1907年溫如公會赴新加坡考察礦務。辛亥革命期間，又往來南洋各國，興辦橡膠園，鼓動華僑籌資集餉。1918年在廣西武宣治辦礦業，後又在故鄉廣建糧食加工、鑄鑊、造紙等多項農辦工業。實業救國，培養「有用之精神」，亦倍受後人景仰、承續。另外，叔父徐玉鬻（字世強，又字世翔，民國初年，為繼續革命，受孫中山囑托，化名「餘仁」，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職員身份籌款海外）舉茂才後東瀛留學，奔走革命，精力過人，歷任桂同盟會副會長（一說為副主任及秘書）、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稽勸局桂分局總編、大元帥府秘書、代理容縣中學校長、梧州關稅局長、廣九路貨厘局總辦等職。⁹「忠於職守，廉潔耿介」，國民政府特授「持躬廉介」匾額，時人譽稱「廉介公」。革新為公，兄弟二人，不相伯仲。

「嶺南徐氏，原為詩禮之族。」「賢哲代生，仕宦不替。」發展到民國初期，枝繁葉茂，仍以望族自居。據1936年徐松石《嶺南徐氏家乘》統計，當時新、容兩地徐氏十七世以下之新進中，有中學以上學歷且健存者已達20人，留學者6人。可見，晚清之後，世紀遞交，嶺南徐氏家統多有更變：徐家因地近外洋，常遠足海外，

故能沾染風氣之先，得悉外情西學；東西相蕩，觀念日新；愛國、開放之族，望甲嶺表。徐松石《嶺南徐氏家乘》〈序〉說：「我嶺南徐氏先人歷史，奮鬥史也，民族奮發之所由賴也……團結史也，民族統一之所由始也……愛國史也，民族復興之所由恃也。」眷眷中華之情，綿綿求進之思，無時無之。（考，1984年徐氏著《歸主六十五年》稱，其家「重視國粹，輕視外來的風化。」¹⁰有關家統的說法與近50年前的《家乘》記載事實，已大有出入。又其父《初學小文集》第卅七至卅九課講授「博愛」、「平等」、「自由」，第四三至五一課講授「道路」、「火車」、「飛機」、「輪船」、「戰艦」、「潛艇」、「電報」、「無綫電」、「電話」，作為「新世界重要事物，使學生喜好。」皆屬西學。第卅二課「同化」更曰：「世界事，如潮流。歐而美，亞而歐。如空氣，繞寰球。非同化，不能休。」亦言明對外的態度）

1908年左右，徐松石隨眾兄妹入「強志小學」，識字念書，熟讀經史詩文（考，《泗把學校師生名錄》載，其時入該校、屬溫如公家者，女性有徐植文、植良、國瑗、葵華、葵常、萸育，男性還有徐振發、振存、振池等）。1914年考入容縣中學第三班。期間，也曾隨父入廣州、香港求學。學業上，溫如公言傳身教，以儒為宗，兼涉佛、道，¹¹知悉傳統口耳、傳注、訓詁之學的法門（按，30年代任上海崇德女學校長，在校刊《德音》第一卷第三期〈青年人閱書問題〉一文中，徐松石認為，「人們的知識，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由視覺傳入來的，文字又是視覺傳遞知識之最重要的媒介。」¹²仍主倡早年習練的「口耳之學」）。德業方面，重道守義，讀書以「通心理」為鵠的，強調人格修養和先知後行，親炙傳統「德性之學」經由「內聖」而開出「外王」法度的觀念邏輯（按，1936年徐氏《示兒女詩》云：「若無道義詩書載，何異蟲魚鳥獸身！」1941年又在《崇德女子中學年刊》〈序〉中稱，「《大學》一書，乃儒家子弟入德之門戶。開章明義，即列平治修齊誠正格致之理。在此入業之中，前數項屬行，後二項屬知。夫子所揭青年入

德之道，根本即此知行二字。」¹³皆以早年治心之學力誠後人）。

總之，廣西徐氏容族，數世而下，數文化、興教育；講科學、辦實業；爭自由、主革命；修人格、明公私；「作公益、重慈仁」……日積月累，達及後輩身心，人文始化，斯文不墜。1915年徐松石自香港渡船赴上海報考上海交通大學，期於實現「科技救國」（此說為徐氏長子徐雙鴻提供¹⁴）。如其言：「屬客家族，生長嶺南，自幼稅居滬上」。¹⁵辭親北上，客寄異地，自擇栖枝，志在取長補短，發奮於他鄉，此皆一如先輩。

二、居滬日久，卓爾成家（1915-1957）

1916年，徐松石投報上海交通大學未果後，以自費生身份考入上海滬江大學預科（按，該校1905年由美國南北浸會建於上海郊區楊樹浦，初名浸信大學，設大學、神學院兩部，1912年命名滬江大學。1952年新中國重整高校，終止教會大學）。1918年升入滬江大學社會系本科（考，在該校有就讀經歷者，還有徐松石叔父徐玉峰〔字南石〕、兄長徐振發、次女徐雙瑜、三女徐雙燕）。學業上，因古典積涵深厚，「國學」一科，竟得免修。1921-1922年間，擔任學生會秘書和校刊《天籟》中文總編，且常以Su Sung-Shih英文名發表見解；力倡「情的文學」，運筆揮毫，才華初綻；¹⁶更因流播新思，激蕩「五四」，廣泛應用「西學」析解中國社會現象，尊譽為「滬江三才子」。¹⁷

受上海新文化運動鼓舞，徐松石此期代表性文章多見諸《青年進步》雜誌（按，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897年創辦《青年會報》，後改稱《青年》，1917年再與《進步》合併為《青年進步》月刊。范子美、奚伯綬、胡貽谷、應元道、潘光旦等人主持，以溝通中西文化為旨，1932年停刊）。例如，〈志願行為之哲學觀〉、〈何謂少年時期〉、〈評尼采的哲學〉、〈托爾斯泰社會學說之研究〉等文，¹⁸筆鋒所及，開始在學理上，基本解構了原有的「中體西用」知識理念和傳統儒學功能範式，由對人格德性力量的追崇之路，轉入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整個西方近代文明

的重新認定和再造。

1921年徐松石首部學術專著——《新的教育理論》由廣協書局出版。爾後，又有譯作《教學的七大定律》、《實用兒童教育學》、《托爾斯泰之社會學說》先後問世（按，1884年美國人John M. Gregory著《教學的七大定律》，1977年浸會基督教文字中心將其收入「明光宗教教育叢書」；《實用兒童教育學》是當時教會師範學校的課本）。1922年還編有《狄雷博士演講錄》。滬江大學素以商科及持續教育著稱，身為滬江學人，徐松石秉承父願，此際的所好所長，端倪已見。

1922年，徐松石大學畢業。學友評語稱：“Insignificant in stature, funny in actions, strong in will. Independent at work, Hsu is full of peculiarities. He never expects any one to pay him honor, yet every one honor him. Certainly no one can estimate him fully at present.”（徐君個頭不高，但舉止成趣，意志堅定，處事獨到，個性鮮明。君之名德，不以外求，尤為眾人敬重。而君之未來，實無人能擬！）自立自強，新人已現，並榮獲教育學學士學位，決意「正式獻身於文字事業」。¹⁹以文興邦，教化國人，就教於上海明強中學（考，Ming-Jong Boys Middle School是創建於1908年的私立男中，1908年與晏摩氏女子中學合併，同年又建立男女合用的教堂，取名「懷思堂」Grace Church。蘆溝橋事變後，與他校合併成浸會聯合中學）、崇德女子中學（考，Shung Tak Girl's School「成立於1905年，乃上海粵僑浸會萬應遠博士與湯杰卿牧師所並辦者。初時僅係小學；直至1914年，始由校長萬應遠師母籌劃增設中學部分。於是四方學子，雲集景叢，學校規模，因而漸具。」²⁰作為教會學校，「初小只收粵僑，高小及中學兼收各地學生，幼稚園及小學兼收12歲以下的男生。」²¹1941年自北四川路新鄉路遷往陝西北路461號，1953年8月停辦，與進德女子中學北校、晏摩氏女中分部合併為上海市第七女子中學，1958年改名上海七一中學。²²另，徐氏上大學時即已寄居該校，邊讀邊教，勤工儉學，時有文字見諸《德音》校刊）。

後來，又經滬江大學美籍校長魏馥蘭博士力

薦（考，1911-1926年F. J. White任校長，力主引進西方教育模式，並將其「中國化」。這一教育理念對徐氏早年學術思想影響至深），獲廣東美華浸會印書局上海編輯部主任一職（按，該局1885年在廣州創辦，1925年遷往上海）。在此，他前後工作5年，主要編寫、印行教會學校的各類課本和編譯聖詩，並廣泛參與建立中國首家基督教文社等活動（考，徐氏曾與著名指揮家、作曲家黃永熙先生合作編譯《神必保守歌》、《讓憂慮隨風去》等聖歌。黃先生時為上海廣東中華基督教富吉堂詩班的指揮，編有《普天贊頌》，抗戰期間又有《斯人何在》、《懷念曲》等名曲，後出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晚年定居紐約）。

一說，徐氏能在浸會文教事業等方面有所貢獻，深賴譯介《聖經史綱》的J. T. Williams牧師、魏馥蘭教士及上海崇德女校校長E Rose Marlowe教士之引介。按，浸會源於英國，是反對教會公會制度的一個宗派，力主「浸禮」，反對「洗禮」，故稱。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脫離羅馬公會後，從英國逃離的「分離主義者」，在史邁斯的率領下，1609年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第一家浸會，後延至北美大陸。1638年逃到羅德島州的威廉姆斯，建立了北美大陸首家有歷史記載的浸會。後來，克拉克從英王查爾斯二世處購得特許狀，羅德島浸會的存在自此有了法律保障，浸會正式在北美殖民地發展。1835年美國浸會員J Lewis Shuck來華宣教，1836年中華浸會創立，在華日盛，1936年10月13日在廣東東山迎來了它的百年紀念會，1948年11月8日中華浸會在上海組成了全國聯會。

1924年，徐松石出版《家庭教育與兒童》一書，承先父之志，探討幼兒教育理論，勝藍之青，1931、1936年兩度再版，在學界影響甚巨。1925年譯述萬應遠（R. T. Bryan）的《實用講道術》，1928年《演講學大要》收入「初中學生文庫」問世。迄於30年代，還編成《實用小學教學法》。可見其早年學術思智，對基礎教育情有獨鍾。日後，徐松石由教育學轉入民族學、宗教學、人種學、歷史學，由關注兒童、學生教育問

題轉入對整個國民性、民族信仰和傳統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早年這種「以少數人化社會之多數人，勿為社會上多數人所化」²³的化性育人、再造國民之精英理念，皆為諸端之濫觴。

1924年，徐松石與郭琪芬女士成婚（考，郭氏原籍廣東，亦屬客族，畢業於上海晏摩氏女校，時為崇德中學附小圖書館管理員，兼崇德幼稚園教員。另，晏摩氏女校初名桂秀女學，1897年由美國南浸會員柏樂緹、吉慧麗於上海老北門浸會堂創辦，後因晏摩太的資助，又在北四川路擴建且易名。1952年，為上海北郊高級中學²⁴），組建信仰家庭，其後，三女（雙薇、雙瑜〔萸〕、雙燕）二男（雙鴻、雙駿）相繼降世。

同期，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艾迪博士（George Sherwood Eddy, 1871-1963）、上海粵語浸會禔良材牧師、上海懷恩浸會劉粵聲（1892-1960）牧師、趙仕章牧師等人，先後引他入教（按，艾迪博士於1913、1914、1922和1934年左右多次來華布道，專門演講「基督教與勞工問題」、「中國之缺點」、「解決中國所有困難之秘訣」等，提倡社會改良主義和推行平民教育，對徐氏影響極大。另，劉粵聲原籍廣東東莞，歷任廣州東山浸會及堅道浸會會牧，編有《美洲華僑教會》、《兩廣浸信會史略》、《廣州基督教概況》、《香港基督教會史》等文獻，1951年任香港浸會神學院首任院長。劉氏與徐氏同為嶺南華牧，私交甚篤²⁵）。信教後，徐松石曾出任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通訊秘書，活動積極，屢委重任。

考，1934年徐氏在《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序言〉中稱，早年他認為，「欲使中國強盛，一切宗教都不需要」，否定中外所有宗教。1984年在《歸主六十五年》中又稱，他最早接觸基督教是在大學一年級受同學林君的傳道和啓蒙。徐氏學生吳宗文在〈徐松石牧師學案初述一〉中亦稱，徐氏是「在著名的青年會總幹事艾迪博士主領的布道會中歸向基督，信主後，在上海粵語浸信會中得禔良材牧師、上海懷恩浸信會馮牧師²⁶、劉粵聲牧師及趙仕章牧師等人造就，後更被按立執事，並獻身傳道。」綜合以上資料可知，徐氏

晚年所持「歸主六十五年」說——即1919年「歸主說」，似不確。因為個人由否定宗教到肯定宗教，由崇儒反道、尊孔仇道，到聽道、向道、慕道、信道，到歸道、講道、傳道，諸多觀念態度的改變都需要時間。另外，徐氏個人與基督教的關聯，似亦遠不止此：幼年家學，外情常有耳聞；改考滬江大學，該校概不招收「非致力於教會者」的招生培養原則，亦當盡在個人思慮之中。所以，圍繞「歸主說」的諸多言論，前後出入甚多，具體軌跡，有待詳考。

1925年4月，身為上海廣東浸會執事，徐松石參與組織了上海廣東浸會20周年紀念會。在該會上，他的〈基督教如何適應今日中國之需要〉一文，強調基督教能促進「民主精神的發長、正當國家和國際主義的提倡、完美物質進步的取獲。」並堅信，只有宗教信仰的本體才是改造中國國民性的靈丹妙藥。²⁷由此，他榮獲由廣州浸會出版部在上海中華浸會書局舉辦的首屆全國徵文比賽第一名。

另外，徐松石「自1926年起，即致力於嶺南民族史前史的研究」。²⁸且已「斷定除了東江以東的潮循區域以外，整個嶺南，自唐以前，最大的土著部族，當推僮人，即今日廣西西部的僮古佬族。」²⁹以此為發端，接著「自1928年以來，喜歡研究民族學。」³⁰並開始「對東南亞民族史深感興味。」³¹（考，徐氏《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書後的引言中稱，1931年以後他才致力於研究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衆多民族的族源問題。徐雙薇在《徐松石簡歷》所記與之同。但所記時間有異）。

總之，到了20年代中期，徐松石的學術趣向有了一次突變。這與時人掀起收回利權運動，促成1927年國民政府對教會大學實施「中國化」、「世俗化」的改造，並激起「國學潮」等諸多世變，一脉相承。

1919-1925年間，朱執信、李大釗、陳獨秀、吳稚暉、胡適和蔡元培等人在中國掀起「非基督教運動」，對中國基督教大加鞭撻。張文開（亦名鏡，著有《批判非基督教言論會刊全編》）、趙紫宸、徐寶謙、謝扶雅、王治心等華牧，以多

元化方式拚力護教。其中，浸會代表、「滬江三才子」張文開始創「補儒說」：認為傳統中國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宗教觀，已定型於先秦時代，此後的宋明理學皆不足與論；藉此，「以基補儒」的宗教對話，只能在基督教義與中國先秦上帝觀、原儒教旨相銜接的層面上得以運行成功。

這一理念對早年徐松石的宗教態度、學術觀點影響深廣。當時他就寫有〈教會學校是否應以讀經為必修科〉、〈基督教在中國的演進及其趨勢〉等文，³²並再次刊發〈基督教如何適應今日中國之需要〉一文予以援助。今日學者認為，徐松石基本依循了張氏「基督審判文化」路綫，認為信仰與文化之間存有張力，中國基督徒必須對自己的文化具有欣賞和批判的能力，視《聖經》為真理，堅守「本土化」原則，以優補缺，去「建立簇新的中國文化」。³³但是，與其他華牧相較，他對基督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的縷述，最為系統、獨到。可以看出，早年「文化救國」、「科學救國」轉向「信仰救國」之後，他的「補儒說」已開始偏離「基督優勢論」，自行新徑而邁向「儒耶平等」。³⁴身為客家後裔，他對羅香林教授(1906-1978)在30年代提出的「客家學」(Hakkaology)，屢有關注。

與這一變動大體相侔，1927年徐松石辭去書局之職（按，廣西河池高級中學《建校以來各任領導名單》載，徐氏出任過當時設在廣西宜州的省立十一中學校長。1928.1-1929.8由其兄徐振發繼任。此說待考），受聘為上海崇德女子中學校長。³⁵

校長一職，正值徐松石身心康健之歲，1952年卸任時，居職長達25年之久。此間，又因其學術成就和聲譽，被上海之滬江大學聘為歷史學教授（一說，又為上海大學、華東大學、嶺南大學所聘）。自此，他「委身於大中學教育，亦數十載」，頻繁活躍於課堂、教壇之上，知行合一，將學術研究、傳教布道、宗教對話融為一體，力求「教學充實、人格感化、宗教實踐」。³⁶如其文：「智德體群四育同時並進，追隨基督展花蘭台石。」³⁷

1930年徐松石獲得崇德女校津貼（按，侄女

徐小惠在〈好學家教應傳揚，自強成才樹榜樣〉稱，其獲徐族祖輩支持留學美國，半工半讀。³⁸當考），遠赴美國田納西州皮亞布迪師範大學（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1979年正式合併入Vanderbilt University）深造，專攻社會教育碩士學位課程，次年獲宗教教育學碩士學位回國。³⁹（另說為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碩士學位，皆誤）以西人先進之理論實施科際整合，受益良多；對美國印第安民族特性和諸多民族、宗教學者，始有接觸之機。

例如，耶魯大學人文地理學者韓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1924年著就《種族的品性》，以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原則解釋中國民族性問題，對此，徐松石確然神會。⁴⁰（按，該書後經潘光旦譯為《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輯入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曾在泰、緬和中國傣族區傳教33年的陶特教士（W Clifton Dodd），1913年從泰國出發，中經兩廣，跨國旅行2000英里調查少數民族，寫有《傣族——漢族的長兄》一書，徐氏也引為同調，大為徵介。⁴¹日後，徐氏在歷史地理學、民族學、人種學、語言文字學等方面的發展造就，與其不無關聯。

1932年徐松石携妻兒回廣東新興探親，有詩云：「卅里新州路，依稀識故家。」⁴²1935年夏，又「由滬過回新興」，訪求舊家譜，實地草繪先祖妣黎氏（成象公徐玉環之嫡妻）墓形，「復向蕉、新、高、容各地分別調查，且引各種史籍以及其他根據，增益考證」，後回滬「編纂數月」，獨創男、女性同列家譜的新例，完成《嶺南徐氏家乘》，次年刻印發行（考，容縣祖居「恒升堂」中現存此《家乘》舊稿多張，文字與刻印本多有出入。另，該譜所列徐氏女性也僅只溫如公一系；徐雙薇《徐松石簡歷》記該譜編於1925年，誤）。

華牧好友張文開去世後，1932年5月至1933年1年期間，徐松石一度擔任《真光》雜誌的筆政（按，1902年廣州美華浸會創《蘇光報》周刊，主筆陳禹庭、張亦鏡，編輯陳夢南、紀好弼，1917年改名《真光》雜誌，1925年隨浸會書局遷

滬，1941年11月停刊），承續「鐵筆」與「多產」的《真光》傳統，與崇德女校《德音》校刊左右呼應，發表諸多有關基督教的論文。⁴³重要者有：1932年〈基督教之實用方面〉認為，「基督教非但是最大真理，而且是最大實用：第一能賜作事之能力及安慰，第二能使吾人感覺人生之真正興味，第三常能增加吾人之人格感動。信主耶穌，確為人生最合實用之事，非僅得蒙救贖而已。」他的「宗教實用論」，更見穩長。⁴⁴1933年〈科學與宗教之關係〉又稱，「宗教與科學全無衝突，科學須靠宗教，而宗教亦須多靠科學。二者非但各有園地，且實相依為命也。」⁴⁵徐氏早年樸素的「科技救國」理念，遭逢此際學界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科學與玄學以及宗教與人生觀的大討論，至此已與宗教信仰相融；近代中國知識譜系中科學與宗教的「二元論」格局，於徐松石一身，也凸現新枝。另外，1940年他在《晨星季刊》第二期上還發表了〈旅滬廣東浸信會〉等涉及宗教史方面的論文。

專著方面，1934年廣學會書店出版了署名為「照流居士」的《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書中，徐氏依大、小乘佛教的判分，將孔教亦分為大、小乘兩支。他認為，「小乘孔教」講「忠恕之道」，後流變為宋明理學；「大乘孔教」論「一貫之道」，保存了先秦原儒宗旨，故「大乘孔教」與基督教義相通，是建構「耶儒並存」的真正基石。⁴⁶此論再次刷新「補儒說」，具體推進「基督優勢」立場邁向「耶儒平等」。

值得提及的是，徐氏截取「詩佛」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之意蘊，對應「松」、「石」，署名「照流居士」這一舉措，折射了當時社會宗教思潮對徐氏的影響及個人努力的方向。當今學者認為，20年代以來，吳雷川、張文開、王治心、謝扶雅等人始以「佛教中國化」的經驗去探索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出路，到了40年代，這一嘗試又由以韋卓民（1888-1976）、徐松石、趙紫宸、和方豪等基督教知識份子予以秉承。此中，徐松石辨析源流，融貫三教，以儒教化的佛教精神去詮釋基督教義，有力推動了「佛化基督」的中國進程。從

學理上講，徐松石已由傳教布道涉足「比較宗教學」領域。⁴⁷

依此署名，他又寫有《人類之光》、《基督教的佛味》（1935）、《聖道起信論》（1940）諸書。特別是1935年作者書社出版了《中華民族眼裏的耶穌》（1948年廣學會再版），作者進一步具體探討如何使基督教義與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融合的問題。該書運用中國儒學、道學和中國化佛教的語言、方法、範疇，對「基督教的方便法輪」、「釋中的景味」和「聖經裏的中國姻緣」等方面，做出了公允、有意義的分析。1941年上海廣學會又刊發《基督眼裏的中華民族》，該著收拾今昔，熔鑄新章，被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定為首次中國基督教著述評選第一名。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創辦人來會理博士（Willard Lyons，又譯李昂）認為，該書度出眾家、精神可畏、說理精到公平，是當時多元化護教論著中的典範之作。⁴⁸

1934年左右，徐松石告假遠赴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受華僑總商會委派，幫助蘇島華商糖米雜貨公司在蘇北棉蘭市創立蘇東中學，並首任校長半年多，史聯對先生時任董事會主席。⁴⁹同期，他正式成為上海浸會牧師，並出任上海基督教中學聯誼會主席、華東七省市基督教教育會會長。

為了更好地研究史地，1927-1940年，徐松石借布道之機四度入桂⁵⁰：1927年在廣西桂北一帶旅行數月；1935年又到桂邊實地調查廣西南寧地區和左、右江流域；1938年春，取道廣東南路入桂，後從桂林開始，經桂北、湘西、黔中、黔南、桂西、桂中、桂東南，再回廣東南部，深入瑤、苗和僮人區域，且在桂平梁峒考查銅鼓的出土與多種古刻；⁵¹1940年暑期，又自桂林入柳州，行走於桂北、桂西及桂、黔、滇三省交界處。⁵²

一路所求，主要是當地風土人情、人口分布、民生狀況，且搜集到諸多少數民族神話、傳說和歌謠集。例如，桂北蒼梧一帶流行的「洪水故事」、「十日故事」、「黃龍故事」、「落雷故事」、「盤古故事」、「石羊故事」、「白公故事」、「竹王故事」等，盡在整理之中。⁵³另外，還欣獲忻城縣瑤人手抄歌本《盤皇書》、苗

民歌謠譜本，⁵⁴並從白褲瑤領袖韋永才處尋得瑤族出海傳說⁵⁵。以上諸端，皆為研究粵江流域發展史和桂省諸族源流提供了重要資料。

此期間，他也曾擇道回故鄉容縣訪親，又在桂林參觀了近代民族學專家劉錫蕃創辦的特種師資訓練班，交磨論學，啓發良多。⁵⁶（按，劉氏為廣西永福人，長期擔任廣西特種教育師資培訓所所長，1934年著《嶺表紀蠻》，是系統研究壯族的最早著作之一）

總之，此段實地考察經歷，於其個人學術研究風格的形成至為重要。正是根植了這樣一種實證精神，徐松石早期閱讀外人著作所潛積的「先入為主」的學風，⁵⁷至此為之一新：從抽象理論的盤旋之空開始降落民間，走向鄉村，走向「實證史學」。此番轉向，他在晚年猶在吟唱，如有詩云：「廿年成敗說洪楊，民族英雄意味長。我過金田無限感，客家魂夢故園香。」

通過整理考察以上資料，1935年徐松石「最先發表論文，說明盤古王和伏羲氏原來是同一個人。」⁵⁸接著，整理出新，一發而不可收。1938年他撰有《粵江流域人民史》（考，《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序言〉稱：「1938年寫成《粵江流域人民史》一書。」但1991年版《華人開闢美洲概論》〈序言〉等皆稱寫於1939年。小異）。1941年日人井出季和太將其譯為《南支那民族史》，由大阪屋號書店出版，飲譽外邦。1945年又著《粵江流域人民史》的姊妹篇——《泰族僮族粵族考》，初名《泰族源流考》，榮獲中央政府教育部1947年度學術著作獎（按，《泰族僮族粵族考》〈序言〉稱，《泰族源流考》最初脫稿於抗戰前夕，且為上海中華書局付諸排印。但「因日軍侵入，時局劇變，印刷停頓，作者暫將原稿取回。」此後，經過補充修訂，定名《泰族僮族粵族考》再行出版。又稱：「作者撰述此書未竟，而慈母倏然見背……謹以此書紀念先母的無窮恩典。」知此際徐母甘淑慈已謝世）。

「壯學」學者張聲震先生認為，1928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周刊》刊發鍾敬文先生〈僮民考略〉等文章，開啓了國人研究壯族的新局。到了三四十年代，徐松石在以上著述中提出僮

族族源「土著說」，極力強調壯族和古代「百越」，特別是「駱越」、「西甌」的關係，闡發「僮族血緣榮耀觀」、「壯族優秀論」、「兩廣居民含有70%壯族血質論」，拓展了研究領域，決定性地終結了外人壟斷「壯學」的歷史。⁵⁹

抗戰期間，徐松石積極投身救亡活動，講論國際形勢時認為，「人心改正實為當今救國之要圖」；⁶⁰並指出，「中國國難之最後出路」當在於「新國家的努力建設」；⁶¹還專門就中日問題，進一步提出打開國難的三個途徑；⁶²呼籲人類應結成同盟、培養神性，以此反抗暴力、贏得和平。⁶³據上海市虹口區區委書記、1947屆崇德女中畢業生盧麗娟回憶：「校長徐松石先生更是一名勇敢的愛國人士，不僅在課堂上鄭重地教育學生愛國的進步思想，更在課餘時間帶領學生們慰問抗日救亡的一綫戰士。」生於茲時，身為華牧，愛國之心未廢。屢任公職，曾多次與聖約翰大學校長沈嗣良(1896-1967)合作，共同辦理教會學校的戰時救濟事宜（按，沈氏為浙江寧波人，著名體育活動家，1919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管理碩士，戰後定居美國）。

戰後，時局趨穩，1947年春，他率領華東基督教參觀宣道團10餘人，東赴臺灣佈道，並於臺北中山南路國語禮拜堂施禮，開創了臺灣教會史上的首例浸禮。⁶⁴

1948年11月20日，好友劉粵聲與梁玉釵女士在上海粵信禮拜堂舉行婚禮（按，原配俞瓊珍女士已於該年2月5日病逝），柯理培（Rev Charles L Culpepper Sr, 1895-1965）院長任證婚人（按，柯氏1923年來華佈道，促成30年代山東教會的大復興，著有《山東大復興》一書。戰後，在上海籌設另一所浸信會神學院。1952年5月抵台，創建臺灣浸信會神學院），徐松石即是此樁美事的介紹人。劉、徐二人情誼，日久愈堅。

1950年6月，徐松石被推舉為滬江大學校董會的常務董事，17日參加了校董會改組後的全體會議。⁶⁵滬江學人終成滬江大學的管理設計師，滬江情結，足慰斯人！

1952年，時局丕變，徐松石生平第二度辭職，連續5年，「杜門修養，除自由傳道外，暇日

輒潛心於著述工作。」⁶⁶專主內斂，精治「漱石草堂」，不達外情，概以讀書、著書為務。涵養有日，屢有新見：1953年，他發現「烏田」是馬來語「Lautan」的原音，從此揭開中國烏田人的往史；⁶⁷後又寫成《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臺灣土族考》、《嶺南銅鼓研究》、《日韓通古斯民族的淵源》諸書（按，《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在滬寫成初稿，赴港後讀到羅香林《百越源流與文化》一書，「深感他的內容豐富」，故有所修訂⁶⁸）。5年之閑，時日苦短，但造詣精進。

三、寄身港灣，文字浩盛（1957-1975）

「驚弓時日，在滬閉門潛修」的生活延至1957年3月，作為「為數不多，政府和社會應當珍重」的「研究中國和東南亞民族史的我國學者」，⁶⁹徐松石作別上海，潸然南下，同時也作別了40多年的青春夢影，異路赴港，別求空間。自此，「離亂餘生，專心傳道、著述。」⁷⁰（按，1957年曾為李觀森《聖經裏的中國》一書作序）。

教會方面，他任職尖沙咀浸會，影響極大（按，該會原為1927年堅道香港浸會的福音堂，1939年12月教會正式成立，命為現名），例如，當時全港所有浸會的團契都改稱「助道會」，唯獨尖沙咀浸會認為徐氏很有「屬靈」份量，不肯依從浸聯會的指示改組，故仍稱「少年團」。後來，他由長老、義務會牧擢升為主任牧師（1960-1975）。同時兼任：香港浸會出版部編輯、總幹事和亞洲浸會出版社社長；⁷¹香港浸會聯會董事、副主席、書報部部長、主日學夏令會和各種研討會講員；⁷²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顧問等。⁷³重要的是，來港前後，變亂驚鴻，心有餘悸，他對20年代大陸神學「本土化」的進程已萌新解，宗教新理念，呼之即出。⁷⁴

例如，1962年首版、1976年已有第四版問世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堪稱徐松石由「補儒說」、「耶儒並存論」、「佛化基督論」轉入「神本位」的標志。該書反思、總結自己往日辨析「四教」諸論，將基督教與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宋學和中國文學等作了一個歷時性的

「總比較」，理性地區分了西方文化的兩個源頭——古希臘羅馬文化和古希伯來文化，重新審視以《舊約》、《新約》為範本的希伯來—基督教文化的神本主義內核，擊破了古希臘羅馬文化與中華儒教在人本主義基礎上「儒耶通約」、達成「優勢互補」的神話，開始力圖將一種跌入人本主義陷阱的大陸神學「本土化」歷程，重新引入神本主義的軌道。因此，他認為，自己「愚昧薄弱，過去的日子，虧欠主的地方很多。」跌入天真淺薄之念，待得今日才清醒發覺：「今日的問題，絕對不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否能夠容納基督教。更加不是基督教能否屈就，或配合中國固有的文明。問題的癥結或重心，在於今日傳揚中國的基督教，是否出於耶和華神，而與耶穌基督的啓示相合。」「主耶穌基督」勝過一切的「武備」、「物質進步」、「愛國心」和「新民族道德」，而成爲中國「最大的需要」。⁷⁵

另外，這一時期由香港浸會出版部發行的還有：《耶和華是我的牧者》（1961）、《靠主喜樂是你們的力量》（1963）、《得生命更豐盛》（1963）、《主日學及查經班手冊》（1963）、《要被聖靈充滿：田間學目第三集》（1964）、《聖經與中國孝道的發揚》（1965，1981再版）、《我的好處不在禰以外》（1965）、《信徒知行集》（1965）、《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1966）、《要行道不要單聽道》（1967）、《使徒行傳探驪》（1968）、《基督裏的婚姻》（1969）、《摸著耶穌》（1970）、《人人傳道》（1970）、《保羅獄中書信鈎玄》（1970）、《主必快來：啓示錄靜修》（1971）、《詩篇綆汲（滿字冊、杯字冊、溢字冊、福字冊）》（1973，研究聖經）、《探訪和陪談》（1973）、《福杯滿溢》、《箴言乳蜜》（1974，研究詩篇作者及年表）、《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1975）、《基督教在遠東的遭遇》（1975）、《詩篇攬勝鹿慕清溪》（1975）、《尖雨沙侖一》、《沙侖默想二》、《沙侖花島》、《田間默想》等。總之，在神本主義的探究分析上，過於往昔。

單篇論文〈改裝的基督和改裝的十字架〉、

〈你們應當悔改〉、〈要等候父所應許的靈〉、〈大變亂中的砥柱〉等，⁷⁶主要集中在《天糧》雜誌（按，1953年香港浸會開始印行月刊，它是《天糧》靈修季刊的前身），特別是1970年他修訂了吳立樂（Watson Lila）1936年編著完成的《浸信會在華布道百年史略：1836-1936》之後（按，1955年吳氏又撰《香港基督教育的先驅》），又相繼與劉粵聲、黃日強一同編成《華人浸信會史錄二（港澳地區）》（1971）、《華人浸信會史錄三（臺灣地區）》（1971）、《華人浸信會史錄一（大陸地區）》（1972）、《華人浸信會史錄四（海外地區）》（1971）、《華人浸信會史錄五（先賢傳略）》（1972）、《華人浸信會史錄四補編》（1975）等系列性宗教史文本，梳理繼往，沉思未來，既有助於個人對神本主義的執信，又有益於今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宗教史，意義深遠。

遠東民族研究方面，由於居港有日，心緒漸寬，加之好友力邀，1959年底徐松石始出任香港浸會神學院教授，⁷⁷（按，該學院於50年代初由香港浸會聯會、美南浸會、滬江大學劉光升等教授共同創設，首任校長林子豐強調基督教信仰的教育理念、注重「保存國粹和中西文化溝通」的教育目的，對在港的徐氏也不無影響）主要講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和「宗教比較學」等科目，1974年他集其講稿出版了《基督眼裏的中華民族——宗教比較學研究》上下冊。同年，還重整50年代初完成的《嶺南銅鼓研究》，改名《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出版。

1960年4月，徐松石又以教授和亞洲浸會科學研究院董事之職，在港與宋哲美教授（Sung Check Mei）創辦「東南亞研究所」（按，首任所長宋氏爲東南亞史和華僑史專家，1929年生於安徽巢縣，中國政治大學教育碩士，美國國際大學哲學博士，歷任文萊中學、馬來西亞華僑中學校長，香港亞洲聯合書院教務長及訓導長，華僑大學、廣州大學等校教授，又曾任菲律賓烏伊拉普斯研究教授，美國加利福尼亞世界大學教授），並欣任導師和歷史研究室主任。作爲一個國際性學術獨立研究機構，「東南亞研究所」以研究東南亞

學 (SEA Sianology) 為中心，以研究人文學術、促進學術文化交流為宗旨。1979年1月在菲律賓設有分所，由許其田博士主持。多年來，該所先後出版「東南亞人物叢書」十多種、「學術研究專著叢書」四種、「東南亞人物叢刊」六種及專刊特刊五種。1965年又創建《東南亞學報》，1970年元月發行《東南亞研究所通訊》，1976年10月還編創《東南亞年鑒》，規模日大。

時下同道之人有劉芝田、王秀南、劉其偉、沈默士、何若良、陳威信、黃福鑾、梁子衡、馮汝陵、蔡忠同、黃枝連等，相與切磋共進，個人學術生命重煥新綠。1962年春，徐松石遠足日本，親赴京都開展學術活動，探討日本神代史的奧秘。時有詩云：「心懷繾綣到東瀛，如此風情別系情。半世征塵虧欠甚，櫻花時節夜傳經。」⁷⁸並借機廣納日本「中國學」之新知，悉心瞭解愛爾文·卑路斯、沼田賴輔、鳥居龍藏、西村真次、松本彥七郎等學者的成就，⁷⁹且為1966年寫成《日本民族的淵源》進行實地取樣。

這一時期的學術論文，主要見載於《東南亞學報》。例如，在第1卷1-7期上，他發表〈《爾雅》裏面的泰國語言〉、〈泰族與嶺南的關係〉、〈透視東南亞民族〉、〈東南亞民族語言的特點〉、〈東南亞民族的遷徙路綫〉、〈東南亞的銅鼓民族〉、〈匈奴蒙古民族考〉等文。⁸⁰後來，又在《東南亞研究所通訊》上發表〈伏羲盤古考〉；1971年在《菲華學報》上刊發〈東南亞語言的中國發源〉。

總之，在港十八載，文字繁富，涉足多端，神話、語言、民族、史地、宗教，遍地開花；南下求生，周旋有度，再展客家風範。

四、客舍加州，問學不輟（1975-1999）

1975年徐松石於香港退休，同年11月移居美國舊金山，三度擇地而栖，客族風骨，至晚尤存。入美後，即聘為自立浸會顧問牧師（按，1906年廣東新會人李濟良牧師創立該會堂，1928年後劉粵聲曾任主持），後著手創辦了舊金山沙侖華人浸會（Sharon Chinese Baptist Church）和多倫多以連（旭城）浸會。

學術上，在同道好友詹益邦、蔡偉波、何鴻迪、徐永強、袁紹斌、游宏湘等人的鼓勵下（按，1979年4月曾為游氏《同心同知》一書作序），徐松石重新關注美洲印第安人與華夏的族源關係。一方面，是「美國加州印第安人研究，開了我們的眼睛。」⁸¹再一次獲取了新的研究理念和資源；另一方面，在論證瑤族開闢美洲的觀點中，他「復用十年光陰，寫成《華人發現美洲考》3冊」，⁸²1981-1985年在香港由詹益邦先生資助陸續予以刊發。1987年又寫有《禹跡華踪美洲懷古》、《漫步諸天：彙通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等著作。1989-1990年，徐松石與外孫伍惟義「暢游墨西哥登印第安人古跡區，心得尤多證實。」⁸³乃不顧年邁，決定重整原書，定為《華人開闢美洲概論》上下冊。後來，又擇其精華，去其英文，更名為《華人發現美洲概論》（三集），1993年4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再版）。學問求精，至老不捨。

1990年，杭州召開「百越文化學術討論會」，主席董楚平先生邀請徐松石入會，終因年高未果，後來提交〈南洋民族的鳥田血統〉論文⁸⁴，且寫有《百越鳥田賦懷十首》寄與大會。其一首云：「日韓南到馬來疆，華夏流風意味長。此會只談吳越事，襟懷應在太平洋。」⁸⁵亦可見高年學者此際的治學胸懷。

1992年夏，「客家研究大會」在福建長汀召開，為此，徐松石除提交關於客家來源的論文之外，又賦詩8首。其三云：「汀州前事日披離，榮楮留踪幾輩知？幸有鳥田開霧鎖，客家研究有今時。」其七云：「多少中華開國事，如今須向馬來尋。」用心良苦，皆在指點津渡，以惠後學。

有鑒於徐松石在學界的創建、成就和影響力，1993年，原「東南亞研究所」董事長詹益邦先生、中山大學歷史系蔡鴻生教授、陳春聲博士，協同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包括《粵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粵族考》、《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日本民族的淵源》、《百粵雄風嶺南銅鼓》。但是，相較於已逾百種的著述大系而言，這只是一粟之水。所以，再度整理，深入研究，尙待來日。

五、結語

總之，如徐松石所言，他「生平有三大興味，第一是傳道；第二是教學；第三是研究史地。而在史地研究中，尤其著重於東方民族歷史的探討。」⁸⁶「書劍風塵歲月移，愛從文史寄幽思。」⁸⁷斗轉星移，一生皆以文史研究貫穿始終。斯人雖逝，所幸斯文猶存！細品其文，回首生涯，無論就哪一端而言，他都無愧此生：他關注中國各類教育的熱忱，⁸⁸他的「本土化」、「本色化」傳道思路，⁸⁹以及他在中國「地名學」⁹⁰、東南亞民族史學⁹¹、中外文化交流史學和比較宗教學上的成就，⁹²都堪稱精杰。

其中，他一生客轉的總路綫——由嶺南入滬，繼而離滬赴港，終至渡洋留美——移步換景，知與行合，足之所履，思即所及，成就了他治學的大體輪廓：教育方面，他由容族鄉村家學走入城市教會學校、由基礎教育理論到高等教育管理、由平民教育到宗教教育，多元對立，各著先聲。文化背景方面，又歷經儒家本位到科技本位、到信仰本位、到神本位的遞變，與時更進，吞吐世風。民族學方面，首先由對客家僮群的關注轉入對華夏東夷諸族的探討，「吳山越水頻追摺」，⁹³「深信中國的東南沿海是東方文化曙光的產地」；⁹⁴繼而掉頭近洋遠東，專論東南亞種和「鳥田族」的後人，又發現「馬來族、日本大和族和中國的吳越閩粵族，以及苗瑤僮傣佬揮等族，實在是同出一個淵源」⁹⁵；最後，更在大洋彼岸，得見「加州和中國的特殊關係」，圓通了太平洋東西兩岸的民族學研究，劃定了「環太平洋地區」這樣一個民族學研究圈。如其詩：「重緝舊情恩怨裏，黃芸香遍太平洋。」⁹⁶治學方法上，又基於傳統國學中的語言文字訓詁之學，求得他山之玉，力引西方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等學科，以攻東方之石。多邊整合，惠及今日。

作者附識：

出版時期待考者有下列各篇：《哥林多前後書發凡》、《羅馬加拉太書味腴》、《看哪神的羔羊》、《主必再來》、《遠東民族史研究》、《蒙恩福路》、《舊約詩歌書問津》、《華夏恩光》、

《舊約通論》、《詩篇欣賞》、《主愛中華》。

此外，拙文屢獲香港詹益邦先生和臺灣周聯華先生指教，特此致謝！

註釋：

¹ 參見徐小惠主編，《徐溫如公家屬行誼記》，第一集（1996年印行），頁4-9。按，本文所引徐氏詩文短句，未詳注其出處者，皆為「恒升堂」所藏片斷；徐松石的著作，在注文中也一概略去文獻責任人。

² 《嶺南徐氏家乘》，1936年印行，頁10、141。

³ 《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74），頁62。

⁴ 《嶺南徐氏家乘》，頁142。

⁵ 《粵江流域人民史》（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63），〈跋〉，頁2。

⁶ 《嶺南徐氏家乘》，頁12。

⁷ 《徐溫如公家屬行誼記》，第一集，頁27。

⁸ 參見《徐溫如公家屬行誼記》，第一集，頁4-27。

⁹ 《嶺南徐氏家乘》，頁143。

¹⁰ 《歸主六十五年》（香港：香港尖沙咀浸會，1999），頁1。

¹¹ 《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上海：上海廣學會，1934），頁3。

¹² 上海檔案館，檔號Q235-3-102。

¹³ 上海檔案館，檔號Q235-3-104。

¹⁴ 轉引何慶昌，〈二十世紀浸信會會牧——徐松石的生平與思想〉，載李金強主編，《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五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2002、2003年），頁83。

¹⁵ 《百粵雄風嶺南銅鼓》（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74），〈序言〉。

¹⁶ 《滬江大學年刊》，上海檔案館，檔號Q242-1-839。

¹⁷ 吳宗文，〈徐松石牧師學案初述一〉，《基督教周報》，1999-07-19。

¹⁸ 《青年進步》，38冊（1920.12）、41冊（1921.3）、43冊（1921.5）、44冊（1921.6）。

- ¹⁹《華人發現美洲考》，中冊（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83），〈序言〉。又《禹跡華踪美洲懷古》（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87），〈序言〉稱：「生平致力於文字事業，至今已六十六年。」。
- ²⁰《德音》，1941年畢業特號。
- ²¹上海檔案館，《崇德子女中學年刊》之《招生廣告》。
- ²²參見張化，《上海宗教通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541。
- ²³《德音》，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
- ²⁴上海檔案館，檔號U106-135-3。
- ²⁵參見李金強，〈二十世紀華人教牧的崛起：兩廣名牧劉粵聲的生平與事功〉、劉少康〈我的父親劉粵聲牧師〉，載李金強主編《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1998年第一期；又，李金強〈兩廣名牧劉粵聲（1893-1960）傳〉，「二十世紀中國再詮釋研討會」提交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01年6月7-9日。
- ²⁶按，估計是馮劍光牧師，1921年作過劉粵聲立牧行按手禮的見證人（參見《粵聲事記1918-1955》，附載於李金強，〈兩廣名牧劉粵聲及其日記——《粵聲事記1918-1955》的刊印〉文後，載《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二十九期，2002年）。
- ²⁷《真光》，26卷2號，1927年2月。
- ²⁸《華人開闢美洲概論》，上冊（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91），〈序言〉，頁1。
- ²⁹《百粵雄風嶺南銅鼓》，頁5。
- ³⁰《泰族僮族為粵族考》（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63），〈序言〉，頁3。
- ³¹《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序言〉。
- ³²《真光》，25卷4、5、6號（1926.7）；26卷5號（1926.5）。
- ³³《代友人答覆一老學究》，《真光叢刊》之2，頁192。
- ³⁴參見吳汝林，《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關係——徐松石與謝扶雅觀點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神道學碩士論文，1987年。
- ³⁵〈會訊：上海崇德中學近訊〉，《真光》，27卷10號，1928-10-15。
- ³⁶《德音》，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9月。
- ³⁷1941年《崇德女校年刊》所載徐氏譜就的校歌詞。
- ³⁸《徐溫如公家屬行誼記》，第一集，頁2。
- ³⁹徐氏自述，好友梁溢長輯錄，《田間默想詩集》（三藩市：三藩市美加華人浸會聯會，1992），頁64-65。
- ⁴⁰《嶺南徐氏家乘》，〈序〉，頁2。
- ⁴¹《泰族僮族粵族考》，頁20、24。
- ⁴²《嶺南徐氏家乘》，頁142。
- ⁴³參見徐松石，〈我與真光雜誌〉，《美加真光雜誌》，1992年，頁2-3。
- ⁴⁴《德音》，第一卷第六期。
- ⁴⁵《德音》，第二卷第六期。
- ⁴⁶參見何建明、賴品超，〈佛教對基督宗教在華的本色化的啓迪〉，載《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1期，2001年。
- ⁴⁷參見蘇遠泰、何慶昌，〈保守與開放——試論徐松石早期的宗教對話〉，《建道學刊》，2002年，18期。
- ⁴⁸《中華民族眼裏的基督》，〈序言〉。
- ⁴⁹《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書前「旅行南洋時留影於蘇門答臘棉蘭」照片。
- ⁵⁰〈苗瑤區布道的獻曝〉，《真光》，39卷6號（1940.6）。
- ⁵¹《粵江流域人民史》，〈序言〉；《百粵雄風嶺南銅鼓》，頁18。
- ⁵²《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序言〉與頁6。又《泰族僮族粵族考》，〈序言〉，頁6。
- ⁵³《百粵雄風嶺南銅鼓》頁51。
- ⁵⁴《華人發現美洲考》，中冊，頁68；又《粵江流域人民史》，頁39、116；《百粵雄風嶺南銅鼓》，頁34。
- ⁵⁵《華人開闢美洲概論》，上冊，頁47。
- ⁵⁶《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頁124。
- ⁵⁷《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頁164。
- ⁵⁸《百粵雄風嶺南銅鼓》，頁61-62。
- ⁵⁹張聲震，〈壯族歷史文化與《壯學叢書》——《壯學叢書》總序〉，《廣西民族研究》，

- 2003年第1期。
- ⁶⁰ 《德音》，第一卷第二期。
- ⁶¹ 《德音》，第一卷第九期。
- ⁶² 《德音》，第二卷第一期，1933年。
- ⁶³ 〈聖誕的佳音〉、〈到國際和平之路〉，《真光》，31卷5、11號，1932年5、11月。
- ⁶⁴ 《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書前「旅行臺灣時留影」照片。
- ⁶⁵ 王立誠，《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滬江大學的歷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408；另參見《滬江大學年刊》，上海檔案館，檔號Q242-1-866。
- ⁶⁶ 《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序言〉，頁1。
- ⁶⁷ 《華人發現美洲考》，中冊，頁2、6。
- ⁶⁸ 《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跋語》，頁187。
- ⁶⁹ 《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跋語》。
- ⁷⁰ 《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序言〉。
- ⁷¹ 特刊出版組，《尖沙咀浸信會五十周年金禧特刊：1939-1989》（香港：尖沙咀浸會，1989），頁45。
- ⁷² 《基督教周報》，1965-04-18、1965-12-20、1974-09-08；郭俊沂，《香港浸信會聯會慶祝浸信會在華一百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浸會聯會，1986），頁146-148。
- ⁷³ 《基督教周報》，1974-06-09。
- ⁷⁴ 參見何慶昌，〈二十世紀浸信會會牧——徐松石的生平與思想〉，載李金強主編，《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五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2002、2003年），頁92。
- ⁷⁵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62），頁389。
- ⁷⁶ 《天糧》，11期（1963.11）、68期（1968.8）、80期（1969.8）、84期（1969.12）。
- ⁷⁷ 何保賢、龔李瑞安，《五十年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金禧歷史圖片集：1951-2000》（香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2001），頁160-161。
- ⁷⁸ 參見《日本民族的淵源》（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74）一書附載的照片及詩文。
- ⁷⁹ 《日本民族的淵源》，頁122。
- ⁸⁰ 《華人發現美洲考》，中冊，頁112。
- ⁸¹ 《華人開闢美洲概論》，上冊，頁48。
- ⁸² 《華人發現美洲考》，中冊，〈序言〉，頁1。
- ⁸³ 《華人開闢美洲概論》，上冊〈序言〉。
- ⁸⁴ 後收入《國際百越文化研究》（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⁸⁵ 《華人開闢美洲概論》，上冊，〈序言〉，頁50-52。
- ⁸⁶ 《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序言〉，頁1。
- ⁸⁷ 《日本民族的淵源·序言》。
- ⁸⁸ 參見黃錚，〈教師、牧師、學者徐松石〉，載《壯學叢書》編委會編，《徐松石民族學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⁸⁹ 參見司徒焯正，《近代神學七大路綫》（香港：證道出版社，1978）。
- ⁹⁰ 參見華林甫，《中國地名學源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 ⁹¹ 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石鍾建，《中國古代銅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⁹² 參見費樂仁著、王劍凡譯，〈現代中國文化中基督教與道教的相遇、論辯、相互探索〉，載羅秉祥、趙敦華主編，《基督教與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李金強，《滬江大學》，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主編，《中國基督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8）；李金強，〈教會與社會：香港浸信教會之研究〉，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載羅秉祥、江丕盛主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賴品超編，《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香港：道風書社，2003）。
- ⁹³ 《日本民族的淵源》，〈序言〉。
- ⁹⁴ 《百粵雄風嶺南銅鼓》，頁104。
- ⁹⁵ 《日本民族的淵源》，頁102。
- ⁹⁶ 《日本民族的淵源》，頁94。